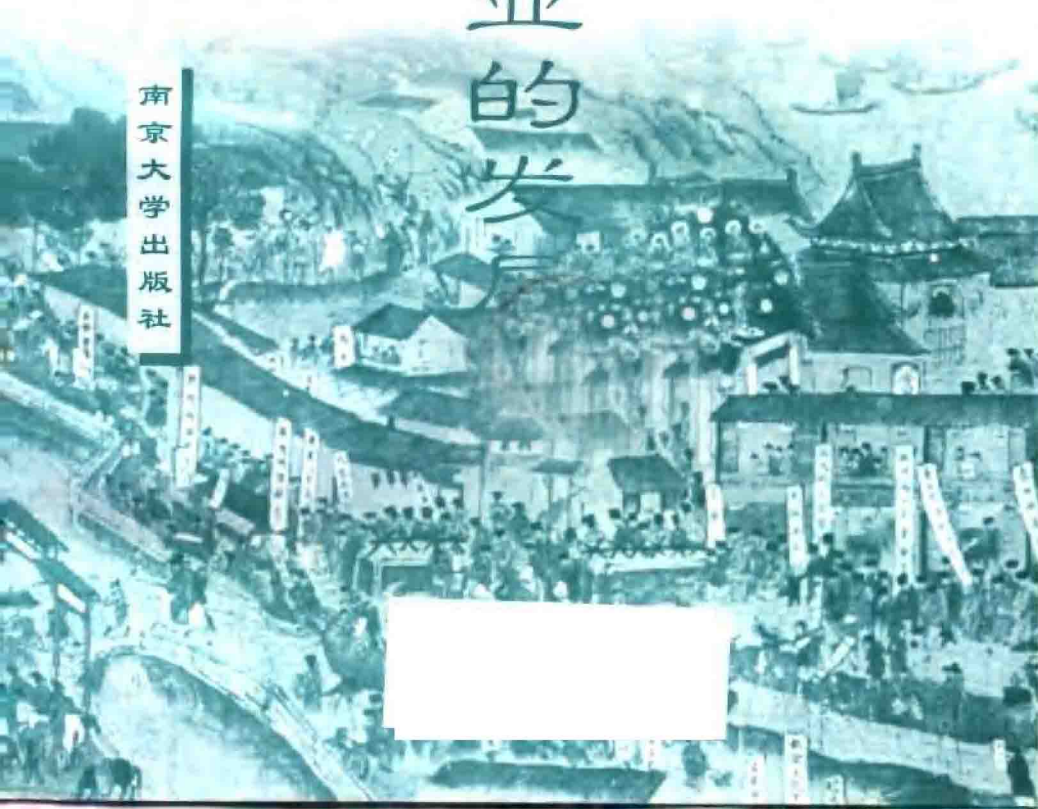


范金民 著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育

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金荣
责任校对:汪 明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范金民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625 字数:302千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305-03155-0/F·487

定价 18.50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序

在范金民教授的新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即将付梓的前夕，我有幸读到书稿的全文。这部全方位论述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专著，是他在多年研究江南经济问题的深厚学识积累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又一项可喜的最新成果。翻开这本专著可以看到：作者在深入研究了明清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之后，接着以此为切入点，依次研究了江南的商品流通问题、江南的商品市场问题、江南的商人商帮问题以及商业兴盛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业内人士一看便知，在专家云集的江南经济研究领域里，如果没有很深的功底，是很难在如此的广度和深度上，完成这一颇具开创性的重要研究课题的。下面我将谈谈展读这部书稿的收获、体会和感想。

在第一章《江南的商品生产》中，作者探讨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江南商品性作物种植的发展，其中涉及到棉花、桑树、席草、靛蓝、烟草、茶树等六种商品性作物种植的情形，在我所见到的同类论著中，这是叙述得最为详尽的一本；二是专业副业商品生产的兴盛，其中涉及到棉布、丝绸、酒、油类、草席的商品生产，纸张的商品生产加工，书籍的商品性刻印和玉石器的商品性加工生产，同时还涉及到包括锡箔、铜铁器、瓷器、裱

襦、造船和折扇在内的其它商品生产的情况,在我所见到的同类论著中,这也是叙述得最为详尽的一本。不仅如此,作者还就江南商品性作物的种植是因何发展起来的这一众说纷纭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灼见。作者不同意持“人口压力”论和“赋税压力”论的一些国内外学者的意见。他反问道:在全国许多地区均存在人口压力和赋税压力的情况下,为什么江南地区的商品性作物种植却能一枝独秀,得到长足的发展呢?他认为:要破解其中的奥秘,就必须“更应注意当地的自然地利条件和农民的获利动机与经营方式”。我认为:作者从明清江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实际情况提炼出来的这一观点,应该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充分重视。

在第二章《江南的商品流通》中,作者在详述了粮产区和棉布产区之间、棉布丝绸产区内部和整个江南地区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商品流通过后,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即:江南丝棉织生产的兴盛,乃是奠立在本地区发达的专业分工、良好的原料供应和畅达的域内流通这一基础之上的。在论及江南对全国的商品流通这一问题时,作者不仅详述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商运路线和流通商品的种类,而且还对流通的商品量进行了科学的计量研究,并进而归纳出本地区商品流通的几大特色,从而将江南商品流通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第三章《江南的商品市场》中,作者细密地考察了包括地方小市场、城镇市场、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和特殊市场——庙会集市在内的江南商品市场的各个层次,并进而考察了几种颇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如粮食市场、棉纺织市场、丝织业市场、竹木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这就为读者清楚地勾画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江南区域市场群体。不仅如此,作者还细心地将明清江南的商品市场与唐宋江南商品市场作了纵向的比较,又将明清江南的商品市场与同时期的北方市场作了横向的比较。通过这些深入的研究,作者在江南商品市场的总体结构及其特色两个方面,均对读者作出了明

确交待,从而使读者获益匪浅。

在第四章《江南的商人商帮》中,作者显示的功力尤深。在这一章里,作者对安徽商人、福建商人、广东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山东商人、河南商人、江西商人、湖广商人、浙江商人和江苏商人在江南地区从事的商业活动及其经营的具体行业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考察,与此同时,还对上述这些商人商帮的活动时代、经济实力、活动地域、从事的行业及经营商品的种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的这一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是:作者通过对全国各省商人商帮在江南的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分析其在江南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互补、竞争和消长情况,无疑大大深化了对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研究;其二是:作者把各省区商人商帮的活动与江南社会经济的特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为深化各省商人商帮的研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新视点。还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涉及地域商人商帮的组织——会馆公所这一长期被国内外学者重视并取得累累成果的研究课题时,亦游刃有余颇多建树。例如:在明清会馆公所数量考一节中,将苏州城区的会馆数从46所增补至49所;将上海的会馆数考定为43所;将南京的会馆数考定为“至少应有39所”;将杭州及其附近的会馆数考定为22所,而这些会馆以前几乎未被研究者提及;将嘉兴府的会馆数考定为13所,而过去的研究者只提及零星的几所;将湖州的会馆数考定为30所左右,而这些会馆今人则基本没有提及;将镇江的会馆数考定为“至少有12所”;将常州的会馆数暂定为4所,而这些会馆过去则从未见人提及。此外,在会馆公所异同论一节中,作者指出:有的研究者“以地域和行业为标准,过分强调了会馆与公所的异,过于绝对,故为人诟病,而新近的研究则过分强调了会馆与公所的同,过于笼统,故仍有缺憾,个别论者更以大商人与中小商人来区分会馆与公所,更属牵强”。而他则主张:“从地域或行业的角度,将会馆和公所分为地域性和行业性两大类,即地域性会馆

公所和行业性会馆公所,会馆和公所都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两类,但又有主次。这样或许会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我认为作者的这一新颖观点,很值得中外有关学者认真思考和充分重视。

至于第五章《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应该说是本书的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在这里论述了商业兴盛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作者明确地指出:商业的发展为江南商品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促使江南的商品生产不断推陈出新,而完备的商业流通体系又无疑有利于商品生产得以健康持续的发展。作者又明确地指出:发达的商业贸易促使和影响了江南大量市镇的兴起,并使其规模得以不断扩大。作者还明确地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造就了富庶的江南经济区。应该特别指出:作者在这一章里,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外学者在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时都要碰到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重要问题,即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问题。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没有导致江南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但也没有导致近年来有人力图证明的江南小农一直处于最低生活水准的局面”。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我国学者所熟知的美国加州大学华裔学者黄宗智教授。1992年,黄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推出的观点是:在1350至1950年这600年间,江南农民拥有的土地不断减少、收入不断下降,生活一直徘徊在糊口水平。其核心理论依据就是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论,又称边际效益递减论。其实,黄宗智教授早在7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我国华北农村经济时,已经推出这一论点,这可以从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得到明证。记得大约在1993年,我国学者曾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上,就黄在以上两书中推出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过研讨。会后,我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对黄的主要论点提出过不同意见,例如:李伯重研究员就曾从理论和概念的角度,对黄所持的“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的说法提出过异议。但

我个人认为：自那时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界对黄宗智教授所持观点的驳议，尚有待完善。如今，本书作者又用较多的笔墨对黄的上述论点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反驳。应该说，这是一次可喜的学术进展。本书作者指出：黄不以年收入而以单位工作日收入，不以家庭总收入而以单个农民的农业收入，来讨论以年成或季节为收入周期、以整个家庭生产为特点的江南农民的经济状况，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若以年收入而论，作者根据人均耕地占有量和明清时期江南正常年景的平均亩产量这二项数据，计算出江南农民田地收入的数字是并不低的。如果再考虑到由于江南农民广泛开展桑棉丝布及其它兼业化、专业化生产，作者认为“直到嘉道年间，其年收入或家庭总收入是稳定或增长的，其生活水平也是趋向不断提高的”。概而言之，作者抓住了边际效益递减论者只计算农民的农业收入而无视农业以外的收入这一致命弱点，并通过对农家全年实际收入与支出水平的运算，用具体数字有力地并富有成效地反驳了单位工作日报酬日趋下降的论点，因此很有说服力。据我所知：作者出生于江南农民家庭，在70年代末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深造前，曾在江南无锡农村基层领导、组织和从事农业生产数年，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并谙熟当地人文地利和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行家里手，因此我认为他对黄宗智教授所持论点的驳论能够击中要害并非偶然。

读完这部书稿，受益颇多，心情十分快慰。我与本书作者既有师生之谊，又曾一起工作共事多年，他问序于我，遂将通读这本著作后的一些看法和体会实话实说了出来，是为序。

罗 仑

1998年春于北京西路2号新村寓所

目 录

序	罗 仑 (1)
绪 章	(1)
第一章 江南的商品生产	(9)
第一节 商品性作物种植的发展	(10)
一、棉花的种植	(10)
二、桑树的种植	(13)
三、席草的种植	(16)
四、靛蓝的种植	(16)
五、烟草的种植	(17)
六、茶树的种植	(18)
第二节 专业副业商品生产的兴盛	(26)
一、棉布商品生产	(26)
二、丝绸商品生产	(30)
三、酒类商品生产	(32)
四、油类商品加工	(34)
五、草席商品生产	(38)
六、纸张商品生产加工	(39)

七、书籍商品性刻印	(41)
八、玉石器商品性加工生产	(42)
第二章 江南的商品流通	(47)
第一节 江南区域内的商品流通	(47)
第二节 江南对全国的商品流通	(52)
一、以江南为中心的商运线路	(53)
二、流通商品种类及商品量	(63)
第三节 江南对国外的商品流通	(98)
一、江南与日本的商品流通	(99)
二、江南对马尼拉—拉丁美洲的商品输出	(113)
三、江南对欧美各国的商品输出	(120)
第三章 江南的商品市场	(130)
第一节 江南市场的层次	(130)
一、乡村小市场—小市镇初级市场	(131)
二、地方专业市场	(134)
三、区域中心市场	(139)
四、全国中心市场	(143)
五、特殊市场——庙会及集市	(147)
第二节 江南市场的类别	(151)
一、以米和豆为中心的粮食市场	(151)
二、以棉和布为中心的棉纺织市场	(159)
三、以丝和绸为中心的丝织业市场	(163)
四、以木材为中心的竹木市场	(170)
五、以典铺和钱庄为中心的金融市场	(172)
第四章 江南的商人商帮	(184)
第一节 各地商人商帮的经营活动	(185)
一、安徽商人的经营活动	(186)
二、福建商人的经营活动	(200)

三、广东商人的经营活动	(207)
四、山西商人的经营活动	(211)
五、陕西商人的经营活动	(215)
六、山东商人的经营活动	(217)
七、河南商人的经营活动	(220)
八、江西商人的经营活动	(221)
九、湖广商人的经营活动	(224)
十、浙江商人的经营活动	(225)
十一、江苏商人的经营活动	(231)
第二节 地域商人商帮的组织——会馆公所	(241)
一、会馆公所数量考	(242)
二、会馆公所异同论	(251)
三、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	(256)
四、会馆公所和商会的区别与联系	(272)
第三节 商人商帮与江南社会各阶层关系	(276)
一、商人与地方政府	(276)
二、商人与江南民众	(279)
三、商人与江南名士	(281)
第五章 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	(310)
第一节 商业发展与江南商品生产	(310)
一、商业发展为江南商品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	(310)
二、商业发展促使江南商品生产不断推陈出新	(312)
三、完备的商业流通体系有利于商品生产	(316)
第二节 商品贸易与江南城镇化	(318)
一、商业贸易促使大量市镇兴起	(318)
二、商品贸易促使市镇规模不断扩大	(322)
三、商品流通直接影响市镇兴衰	(325)
第三节 商品经济与富庶的江南经济区	(327)

一、商品经济使江南农民得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	(327)
二、商品经济使江南地区能够提供繁重的赋税 ………	(340)
三、商品经济为江南人才辈出奠定了经济基础 ………	(342)
主要参考文献 ………	(345)
后记 ………	(358)

绪 章

本书是国家教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申请项目名为明清江南商业和城镇经济的发展,拟从商业和城镇经济互相影响的角度考察明清时代江南商业和城镇经济的发展历程,后来考虑到有关明清江南城镇经济已经有了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森正夫编《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和琳达·约翰逊编《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Linda Cooke Johnson,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前贤力著在先,笔者若再妄为陈述,既重梨枣之灾,又类狗尾续貂,于是将研究范围收缩,专门讨论明清江南的商业问题,成此《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一书。

本书所指江南,大体上相当于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明清时期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府和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府及清代雍正年间从苏州析

出的太仓州八府一州之地。作这样的地域界定的理由,请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一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论述时段则下限大体上到太平天国革命兴起。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江南的传统农业经济在唐代迅速崛起,宋代大为发展,经元至明后期已趋向顶峰^①。北宋中期人范仲淹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②北宋晚期政和时的赵霖说:“天下之地,膏腴莫美于水田。水田利倍,莫盛于平江。”^③同时人秦观称:“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粤,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④北宋末年已盛传“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到了南宋更广泛流传“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发达的农业生产奠定了江南经济的坚实基础。明清时期,江南在人均田地日益下降,边际报酬日益递减的情形下,仍为全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区,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江南始终走在全国经济的前列。

江南经济是如何持续发展的?推动其久盛不衰的动力又是什么?这类问题,较长时期以来一直引人深思。1988年,笔者所在的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及地理系的同仁和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学者等就长江三角洲小城镇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历史学和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拟就了合作协议,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探讨导致长江三角洲自宋代以至今日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因,试图将小城镇的发展作为着眼点。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是明清时期江南社会

① 相关研究可参考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汲古书院1988年版;方如金《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周生春《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梁庚尧《宋元时代苏州的农业发展》,许倬云等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1983年版;李文治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

② 《范正公集》卷九《上吕相公呈中丞咨目》。

③ 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

④ 《淮海集》卷一五《财用下》。

发展的一大特色,但这一特色的形成,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小城镇经济实际上就是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明清时期,江南农家已普遍开展“与自给生产相结合的商品生产”^①,成为“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这些农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②。虽然学者们的认识不尽一致,但明清时期江南的农家经济已体现出浓厚的商品经济色彩,农户已与市场发生着日益紧密的联系,则殆无异议。大批城镇就是在这种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作为江南农家的两大支柱产业——植棉织布和蚕桑丝绸业就是主要以市场为依托的行业,充分体现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因此,商品经济可能正是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

实际上,明清时人已隐约认识到商品经济在江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隆庆《长洲县志》的修纂者说:“长洲延袤不百里,而湖陂居三之一,田赋居十之二,此岂尽利于蔗蓑哉,商贩工伎,干没射时,以身所营,给家之食,而以田所充官之税。”^③崇祯《吴县志》的修纂者图说阊门繁华时也认为,“吴之所以饶,颇赖是耳,为行货往来者于此市易”。明后期人说,东南吴越间,“人既繁且慧,亡论冠盖文物,即百工技艺,心智咸儇巧异常。虽五商辏集,物产不称乏,然非天产也,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④。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则谓,苏州“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颇以市易为之”。《明经世文编》的编者也在宣德时应天巡抚周忱的“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一语下

① 魏金玉:《封建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②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③ 隆庆《长洲县志》卷二《田赋》。

④ 王士性:《广游志》卷下《物产》。

加注：“以其逐末技也。”乾隆中期，两江总督高晋曾总结性地说：“窃照大江南北，江宁、镇江、常州、苏州府属地方，土多沃壤，民习耕种，且能手艺营生，衣食足资利赖。”^① 当时人的这种种说法，是基于现实的实际之论，对于我们今天探讨问题颇多启发意义。商品经济为江南农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发展商品生产，兼营各行各业，开展多种经营，江南农民的谋生路子较为宽广，生活也较为安定。商品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由明初的江南人纷纷外逃而转变为明后期以迄清中期的全国各地人纷纷涌向江南，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江南在明清时期始终是国家财政的最大贡献的地区。如果无视或否认这一点，像个别学者那样仅仅着眼于农民边际报酬递减，只计算农民的业农收入，而不考虑业农外收入，主张江南农民长期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的贫困处境^②，就无法真正认识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也无法如实揭示农民生活的基本状况。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力图从商业的角度，比较系统深入地考察明清江南的商品经济，以探讨商业发展在江南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全书着重阐述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流通、商品市场和全国各地域商人商帮在江南的活动。

第一章《江南的商品生产》，是作为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前提和优势而设的，旨在通过考察江南的商业性农作物种植和专业副业商品生产的兴盛，以说明江南商业发展最根本的前提在于当地发达的商品生产。由于具体述论江南商品生产各业的论著较多，因此本章只作综合性的宏观考论。江南商品生产发展而原料远远不敷所需，商品性生产日益发展却日益依赖海内外市场，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因此，江南商业的发展也是建立在

① 《请海疆禾棉兼种疏》，《清经世文编》卷三七。

② 有关论述可以参考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中译本。

与全国乃至海外市场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上的。只是纯粹是出于全书结构的考虑,有关内容才安排在第二章讨论。江南商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交通优势:江河海三大运道兼备,境内河渠成网,四通八达,位居南北东西要冲,可以说,江南商业发展也有赖于天然便利的交通条件。江南商业在明后期迅速发展,按照万历时徽商黄汴的说法,由于嘉靖七年监察御史瑞州府人朱寔昌奏定门摊税而不税客货,苏松常镇一律奉行,于是商贾更加聚于苏州,而杭州次之。黄汴将朱寔昌于嘉靖四年奏定门摊税错置为嘉靖七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标点本《天下水陆路程》又误刊误标为“御史朱寔昌,端州府人,嘉靖七年,奏定门摊客货不税”,致引起人误解为苏松常镇四府不征门摊税。奏定门摊税的缘由及其具体办法需要专文考证,由于本章立意只在商品生产,故略而不论。江南商业发展与包括改征门摊税在内的全国赋税制度的变革,流通条件的改善,信用手段的提高等都有关系,但这种全国性的改革不足以充分说明一地商业的兴衰,又与本章立意不符,故同样略而不论。

第二章《江南的商品流通》,以江南为中心,分三节依次考察江南区域内的商品流通、江南与全国之间的商品流通和江南对国外的商品流通,重点考察商运线路、流通商品种类、商品数量,既想说明江南在特殊的经济结构下与全国乃至海外的商品流通的重要意义,又想通过几种主要商品流量的探讨说明江南商品在对外流通中所具有的种种优势。江南商品在对外流通中的种种优势,也正是江南经济在全国领先的根本所在。

第三章《江南的商品市场》,应该是江南对外商品流通的起点或终点,出于篇幅和论述的需要才专立一章。先从市场等级角度,考察了江南市场的各个层次,再从商品角度,考察了江南的几种专业市场。江南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市场兼备,它们既各有侧重,发挥特有作用,又互成网络,构成完整的区域市场群体,成为全国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的机能,既

不同于同地区前此的唐宋时期的市场^①（如龙登高认为：“与明清江南市场相比，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中，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而它与外地市场的联系尤为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就区域市场格局而言，明清各类专业市镇的迅速成长，使市场网络更为细密，商品流通更为顺畅。”）；也不同于同时期的北方市场（如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认为：“北方区域市场之间的商品交换有如下明显特点：一是北方地区的手工业产品主要在本区域内交换，最多是在北方地区各区域市场之间交换，很少销往南方各区域市场，而南方各区域市场销往北方各区域市场的商品却主要是手工业产品，例如棉布、绸缎、铁器、瓷器等；二是北方各区域市场销往南方各区域市场的商品主要是棉花、皮货、花生等，但是这些商品都没有形成全国性市场，影响都不大。”）。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明清江南市场的特色勾画了大致轮廓，可以省却本章的不少篇幅，而本章所着重分析的内容，相信会进一步充实上述看法，而且更能反映明清江南市场的发育程度。

第四章《江南的商人商帮》，以江南为地域空间，以省域为商帮的籍属范围，对活跃在江南的安徽、福建、广东、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江西、湖广、浙江、江苏商帮等作了较为全面而又具体的考察，依次探讨了这些商帮在江南的经营活动、建立的会馆公所及其与江南各阶层的关系。近年来，商帮研究方兴未艾，但地域界定不尽合理科学，研究也多局限于某一商帮在全国或一地的活动，而对一个地区各支商帮的竞争角逐的研究则尚为少见。本章比较细致地考述江南这一经济最为发达地区各地商帮的活动，相信有利于认识江南地区商业发展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程度，也有利于推进商

^① 相关研究可以参考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和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